

# 及壮 糊口于沿江中路

欧阳光宇

作家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自谦而有趣的自传,其中有句话为“及壮,糊口四方”,这话给我的印象深,我没有老舍先生“糊口四方”的本领,但我在及壮之年,曾有九年时间,于工作日,必经株洲的沿江中路。准确地说,我来回走过的,是株洲大桥起始,往北约300米的沿江中路,属于这条路的开端,曾经那块“沿江中路”的路牌,至今印在我脑子里。

我那时日日经过这个路段,是因为我供职的单位在这条路上,我是基层职员,所以我我说我糊口于沿江中路,是为写实,不能等同于老舍先生的自谦。

从1997年秋天开始,我便时不时步履匆匆地走在沿江中路上,左边是湘江,右边是株洲宾馆、七一路口、株洲市人大机关大院及其所属的仁达宾馆。在一位基层职员眼里,繁华之外,会觉得这在株洲是一条很牛气的路,以往株洲市委的办公楼群,便布在沿江中路68号,株洲宾馆的前身便是株洲市委第一招待所,在株洲大桥尚未修建、河西尚未开发之前,沿江中路开端的300米,无疑是株洲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
追溯历史,沿江中路是1971年开始修建的,至1976年始告竣工,今株洲大桥位置至白石港为沿江中路,路长2400米。当时株洲大桥还没有修建,河西的菜农挑菜坐轮渡到河东来卖,停靠的码头就在现株洲大桥附近,而曾经的株洲市委就在沿江中路的东面,面朝湘江,与挑菜上东岸的农民,斜对角线相距也就300多米,可以说是既连接城市决策者的公文包,又连接着河西农民的箩筐扁担,是一条颇具包容性的路。

我1997年开始打卡沿江中路时,这条路已21岁,是一条成熟、体面的路,虽然株洲市委、市政府已搬往河西,而市人大、市政协却还在这条路上,这条路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。与其垂直相交、上坡相连的两条路都很有分量,一条是通往中心广场的路,这条路既连主干道建设路,又连城市枢纽级的十字路口,中间还集结了城建、税务、邮政、电信等委办局,这里的

经济指数也是株洲的翘楚,那时在这条路上开打印店的一对小夫妻,赚得盆满钵满,得以在中心广场亮眼的楼盘中买房。还有一条与沿江中路相连的上坡路是七一路,彼时,这里是株洲KTV做得最大的一条路,商业利润和人气指数双佳。

我匆匆走在沿江中路的那些年,盘桓最多的地方是沿江中路68号,早晨在那个靠北的小卖部买早点,边走边去上班,中午在机关食堂买盒饭当工作餐,逢晴天还曾坐在食堂旁边的草地上吃盒饭,后来这个食堂改扩建成仁达宾馆,现在那里仍是宾馆,只是换了个名称。

当时在68号机关大院门口,立有一个较为高大的绿色邮筒,那时候用QQ邮箱发电子邮件尚未普及,我们常将贴好邮票的纸质信件,投进这个邮筒。

除了沿江中路68号,我的第二盘桓地便是株洲宾馆(现大汉·希尔顿酒店所在地),曾因为单位的会议,我在这里做会务工作,还以这里的雕塑、喷泉、水池为背景留影,又因为这里的花草树木好取景,我那时还领着我的父母来株洲宾馆,以迎春花的花枝做衬景,为父母拍照。

那会儿我小孩尚年幼,我常用午休时间去芦淞市场买幼儿的衣物和玩具,再拐弯到沿江中路上去上班。有一回我手持两个布娃娃,遇到我在电大财务时的一个男同学,他彼时还是个快乐的单身人士,之前他给我打电话,名义上是问候,实际上是用比较揶揄、比较“毒”的口吻问我,说你生了小孩之后是不是变成肥婆了?而我在小孩出生不久,根本无暇增肥,因为当时的就业形势也紧张,为了谋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,我马不停蹄地奔赴新职,白天上班,晚上哄娃,人都瘦了一圈,但这切不可作为减肥经验,这里面的艰辛也只有自己知道。我与出言较“毒”的男同学在沿江中路上四目相对,我单瘦的样子否定了他的“肥婆说”,但我并不轻松。

从1997年秋到2007年春,我在沿江中路上经历三十而立、澳门回归、世纪之交、搬家、再搬家,回想起来,那真是我养家糊口的日子。

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沿江中路



▲如今的沿江中路一隅

真情

## 父亲也曾是 追梦少年

马亚伟

父亲的初中同学刘叔来家做客,聊起了很多往事。

刘叔对我说:“你爸这个人呢,小时候可有梦想了。上初中时他最大的梦想是当兵,那时我们俩经常偷偷跑去五里地外的部队,隔着墙偷偷听里面喊‘稍息、立正’的声音,你爸听得特别激动,恨不得翻墙过去看看。”我知道,那个年代,男生大部分都有当军人的梦想。刘叔接着说:“后来我和你爸学瓦匠,我们俩学得都不错。你爸想去大城市的建筑队,要不是我舍不得离开家,拉了后腿,我们俩就成了国家正式工人了,现在都有退休金呢……”

刘叔还说起很多父亲当年的梦想。我忍不住问父亲:“爸,我叔说的是真的吗?”父亲嘿嘿一笑说:“是真的,谁小时候还没点梦想呢!”可是,我很难把刘叔的讲述跟眼前的父亲联系起来。眼前的父亲,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,家和儿女就是他的全世界,他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这个世界。难道他曾是追梦少年?事实上,父亲真的曾经是怀揣那么多梦想的人。

可是,父亲梦想是什么时候被隐藏起来了?我觉得应该是他成家以后,做了父亲之后。我现在还记得,有一年有人来找父亲,说很远的外地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,问父亲去不去。父亲推辞说:“不去了,孩子还小。家里事多,孩子妈一个人忙不过来。”

父亲的梦想,是做了父亲以后,被他埋藏在心底的。做了父亲以后,他不再有那么高又远的梦想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凡朴实的小愿望。比如他想种粮食之外再种点西瓜多赚点钱,他想给家里添置一辆自行车,想给妻子买件新衣服,想给孩子买个新书包……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愿望,支撑起了父亲的生活,甚至他的整个人生。

我想起那首叫做《父亲的散文诗》的歌:“一九八四年,庄稼还没收割完,儿子躺在我的怀里,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,没时间去看。妻子提醒我,修修缝纫机的踏板……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,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……”我听过这首歌的时候,特别有共鸣。歌中父亲的形象,正是我父亲的形象。他平凡琐碎,深爱妻儿。世界很大,他的世界却很小,小得只有一个小小的家。曾经的那些所谓的梦想,就像是一个个闪光的泡泡一样,飞出了他的世界,无声无息破灭了。

如今父亲老了,梦想对他来说好像成了奢侈的字眼。提起梦想,他只能在往事的回味中感受了。我对父亲说:“爸,你听说过这句话吧: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不管多大岁数,都可以有梦想。而且,有梦想谁都了不起!”可我的这种“鸡汤式”的话,对父亲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激励作用了。他又是嘿嘿一笑,说:“我现在的梦想,就是你们几个的日子都过得好好的!”

大概每个男人做了父亲之后,他的梦想就全都跟儿女有关了。不过,我还是想帮父亲实现一些小梦想。我知道,如今父亲也有很多心愿,比如他想去各地走一走,看看祖国各地的风景;比如他想跟外地的老友聚一聚,回忆一下美好的青春时代;比如多跟亲戚们走动走动,感受亲情的温暖。这些梦想,我一定要帮他实现。

亲爱的父亲,当年你为儿女放弃梦想,如今儿女要帮你实现梦想!

旧事

## 我是寄宿生

谭光辉

1980年,攸县嵩山中学还有最后一届高中生。在招生比例极低、住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,我不仅应届考上了初中,还幸运地成为了本部的一名寄宿生。

那时我羡慕五种人:食宿无忧的教职工子女;除了上课,吃住在家走读的学生;只寄早餐,每天有新鲜的下饭菜的学生;只寄餐不在学校住宿的学生;频频热饭热菜,在食堂吃菜的学生。

我不是教师子女,也不住在学校附近,更没有在周边的兽医站、粮站、供销社、纸厂、银行、农技站等单位上班的亲戚,无法享受上述学生的优待。在食堂吃菜,虽然不是南瓜就是萝卜,不是白菜就是海带,不是猪血就是豆腐,且一个月只需四块五毛钱,但对于五毛钱可以花上一个学期的我来说,简直是一种奢望。

走读生有走读生的优越,寄宿生也有寄宿生的滋味。

寄宿生的下饭菜多为炒豆干、干辣椒炒虾米鱼仔、霉豆腐,条件好的也有带腊肉腊鱼油豆腐的。

初中三年,感谢母亲每个礼拜变着花样给我准备下饭菜。我带得最多的菜是干辣椒炒虾米,一个礼拜一罐头瓶。1981年下半年,大姐家乔迁新居,我跟堂弟到她们家带过一次“冻”(各种剩菜混合熬制而成)。姑父是砖匠,带了好几个徒弟,过年过节,徒弟都要送礼,有时还帮人家做厨子,常常带着些普通人吃不到的猪肉。每年正月过后,小姑常让我礼拜天去改善生活。返校前,还会特意为我炒两罐头瓶腊肉。

寄宿生每人一个木箱,里面除了一身换洗衣服外,就是要吃一个礼拜的菜。睡下铺的,木箱用红砖或木板垫着放在床底下;睡上铺的干脆把木箱放在床上。每天晚自习下课,寝室里那微弱的灯光下,全是开箱吃菜的室友:他们或趴在床底下用头顶着箱盖,或坐在上铺打开箱盖,整个寝室弥漫着各种菜的味道。不用去看,就知道谁谁带的是什么菜。大家一边吃着,一边计划着剩下的餐数,往往是先紧后松。要是计划不好,后面几餐只能靠着几颗豆子、半块盐蛋下饭了。

寄宿生菜品单一,一个礼拜就是一种菜,吃得让人发腻,特别是那又苦又涩的咸鱼仔。有时候,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换着吃,也确实是一种享受。南源同学的酸菜炒春笋是春天的味道,江冲同学的辣椒炒豆子香气袭人,琴陵小年家的腊肉回味无穷,水晶岭新民家的竹鸡斑鸠最是难得。有一次,我在小舅家用麦乳精煮了

一大盆新鲜野猪肉,第二天早上吃就觉得味道不对了。中午,我央求几个同学帮忙解决。接下来几天,我只得忍着吃别人的了。有时,有同学的菜不幸变馊了,有同学的菜不幸被人偷吃了,只好到处借钱到合作社买那两毛钱一斤咸得人死的萝卜条来对付。

对每个寄宿生来说,最美的声音莫过于吃饭铃声。铃声响起,冲到最前面的仿佛是“饿煞山”下来的寄宿生。寄宿生最恨的是喜欢拖堂的老师,哪怕拖堂一秒钟,也会改变吃饭的进程;最恨的是负责值日的老师,哪怕是提前一分钟进食堂,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。

拥进食堂,挤近餐桌,筷子、叉子、调羹朝着同一个目标。一盒八块饭,手快的选中中间最大看上去也最干净的一块,手慢的只剩最小块。虽然食堂用划饭器分饭比席长分饭进步了许多,但也难免存在着些小误差。要知道,在那个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代,多吃那么一丁点都是大赢家。八个人同班还好说,同时下课,再怎么也亏不到哪里去。最惨的是编在混合席:几个班下课时间不统一,最后赶到恐怕只有那惨不忍睹的一小块,负责洗盆的甚至还把它倒扣在饭桌上。

那时,食堂偶尔发生打架事件,不是争风吃醋,只因分饭吃了亏。直到后来食堂废除了大盆蒸饭,改用专人专盆,才减少了这方面的纠纷。

那时,几乎人人能吃。食堂把三三两两成了四两后,还常有男生吃到最后,眼巴巴地望着窗口,等着难得的加餐机会。碰到有人请假未用餐时,其他几位就会毫不客气地平分那一份。我们总怀疑食堂蒸饭时没下足量,常把问题反映到学校。学校组织学生会干部“监钵”:学生代表半夜三更到食堂监督工友称量淘米分盆上蒸笼,在我们自己称重淘洗的那盆上做好标记。也不知怎么回事,我们标记的那盆竟比没做标记的还少一些。

寄宿生住在老教室里,几十个人一间的上下铺。夏天蚊子多,冬天汗脚臭。冬天,起床铃后,各班要派人分热水洗脸,一人一水斗。周三不上晚自习,没回家带菜的常溜到隔壁纸厂看电视。

熄灯铃响起,老尹的哨子准时响起。大家轻轻地锁好箱子,蹑手蹑脚地爬上床,生怕再出声响。不幸被老尹逮着,罚扫寝室事小,抓到主席台亮相可就尴尬了。

那时,你要是在骂山寨小路上碰到一个用肥料袋子装着米,用塑料袋装着罐头的,不用猜,准是像我这样的寄宿生。

记事本

## 一张破损的粮票

刘英

四十年前,在母亲生我的那天凌晨,父亲穿着一双草鞋去离家三十多里的外婆家借粮。平时家里日子过得挺艰苦,父亲不想让母亲坐月子还那么辛苦,于是决定去外婆家借粮。

当时,外婆把家里唯一的一张5市斤的粮票给了父亲。回来的路上,明明是艳阳高照的天气,可下一秒就开始下起了暴雨。父亲担心粮票淋湿弄坏了,赶紧找了一个山洞躲起来。可父亲也在担心即将临盆的母亲,于是赶紧找了些树皮和树叶把那粮票包好。这时他依然不放心,脱掉身上穿的衣服在树叶外面又严严实实地包了一层。在看到雨小了一点的时候,父亲冒雨快速往家里赶。

回到家,父亲却看到自己家的茅草屋快被大风吹倒,挺着大肚子的母亲正在雨中用一根木头,艰难地支撑那摇摇欲坠的茅草屋。父亲看到这一幕,心如刀绞。接过母亲手里的木头,立即让母亲回屋休息。在父亲快支撑不住的时候,幸好风停了,雨小了,茅草屋保住了。

可当父亲想起那张粮票的时候,因为太着急帮助母亲,那包着的粮票被自己不小心踩在了脚下。当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带着泥浆的包裹时,发现那粮票已经破烂不堪。父亲努力地想修复它,可最后却是徒劳。

月子里,母亲因为没有吃饱,没有奶水,而我也饿得天天大哭。自责的父亲暗下决心,一定要让妻子过上好日子。所以,后来父亲没日没夜地开垦后山那乱石堆的上坡,想多种一些粮食。

就在父亲快开垦完,搬走最后一块大石头时,父亲的腿却被石头砸伤,落下了永远的残疾,从此无法再干重活。为了养活一家老小,父亲开始苦学手上能做的手艺:他学会了用竹子编各种竹器,学会了嫁接果树,学做各种民间小吃,还学会了木工。虽然日子依然清贫,但一家老小至少不用再饿肚子。

后来,我大学毕业后,阴差阳错当了一名英语老师。虽然所教的班的学生英语成绩总体不错,可我还总因为自己口语太差,一直自卑不已。虽然,曾经也努力地改变过,但效果甚微,这让我更加怀疑自己,整天无精打采。

父亲知道后,打开柜子,从最里面拿出一本发黄的,翻开其中的一页,找到当年那张破损不堪的粮票,然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。父亲什么也没有说,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出屋子,准备去院子里继续编背篓。

看着手里这破损却被平整的粮票,还有那腿残疾却双手灵活的父亲,我突然明白,我要学会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,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。于是,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大量地阅读,尝试写作。想不到多年之后,曾经没有任何写作功底的我,竟然发表了几百篇长短不一的文章,还加入了省、市级作协。这让曾经读书时一篇作文都没有被老师表扬过的我,慢慢有了自信,也学会了接纳和肯定自己。

就在前段时间,一次意外,女儿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。为此,女儿悲伤地不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,我如当年的父亲一样,把那张破损的粮票小心翼翼地递给女儿,给女儿谈起这张粮票,以及她残疾的外公和我曾经的经历。女儿若有所思,开始频繁进入图书馆,阅读大量的书籍,寻找着力量和勇气。她还参加各种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有一天,我无意间看到女儿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到这样一句话:“破碎不是最残酷的事,人要学着踩着这些碎片,努力把生命里的不幸变成人生的奇迹。”

我知道,她已经从那张破损的粮票中汲取了力量,学会了面对和接纳生活的不完美,并将这些经历转化为自己成长的动力。那张破损的粮票,不仅见证了父亲和我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奋斗,更成为我们家族传承的宝贵财富。